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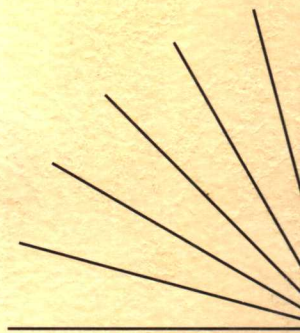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上·

许志英 邹恬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上)

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上册/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3
ISBN 7-5334-3136-7

I. 中… II. ①许…②邹… III. 现代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553 号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上)

许志英 邹恬主编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

开本 850×1168 1/32 21 印张 508 千字 4 插页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300

ISBN 7-5334-3136-7/I·186 定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许志英 邹 恬 1
绪论	3
第一编 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	23
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	25
第二章 “自我表现”	48
第三章 个性解放	69
第四章 人生探索	90
第五章 “非战文学”	111
第六章 “乡土文学”	128
第七章 反帝主题的初步形成	149
第八章 历史与现实之间	163
第九章 “光赤式的阱” ——革命加恋爱	183
第十章 个性解放主题的淡化	200
第二编 文学与革命（1928~1937）	221
第一章 文学与革命	223
第二章 反封建主题的深化	250
第三章 从“短裤党”现象到“子夜”现象	270
第四章 “咆哮了的土地”	292
第五章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	316
第六章 灰色的人生与变形的灵魂	330

第七章	都市的五光十色	348
第八章	远离尘嚣并非净土	371
第九章	反帝抗日文学的兴起	389
第十章	时代的激情与个人的梦幻	407
第十一章	叛逆的与隐逸的	431
第十二章	“大众化”与“化大众”	461
第三编	战争与文学（1937~1949，国统区）	479
第一章	抗战文学的兴起	481
第二章	历史、个人与道德自救	501
第三章	人性的审视	528
第四章	怀乡主题	548
第五章	“精神奴役的创伤”	572
第六章	浪漫传奇的现代包装	592
第七章	民族形式问题	613
第八章	现实讽刺与政治讽刺	635

序

许志英 邹 恬

本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比较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潮或主流。究竟什么是文学思潮，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已有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诸如李何林著《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朱寨主编《当代文学思潮史》，侧重于对文学运动、思想论争、理论倡导等方面的爬梳剔括、探幽发微。这似可称作理论思潮。那么，对思潮是否还有另外的认识、理解，我们想是可能有的。至少，与理论思潮概念相对称，可以提出一个创作思潮的概念。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的这个课题正是在确认了创作思潮的概念之后，才确定下来的。本课题主要想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时间上涉及六十年，即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七六年。分为六编。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二编为《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三编为《战争与文学》（1937～1949，国统区）；第四编为《延安文学》（三十年代末至1949，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五编为《英雄主义的高扬与人的迷惘》（1949～1966）；第六编为《“文革”文学》（1966～1976）。这六十年，我们认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七年至一

九二七年，第二阶段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七六年。

本课题力图显示下列特色：

一、以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一些主要方面）演进过程的宏观把握为中心线索，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结合起来，既大体描述出六十年间文学主潮演进的大体过程与风貌，又对其阶段性主要特征、得失影响作出较为科学的概括论述。第一阶段的创作思潮同理论思潮一样，呈现出“万花缭乱之趣”，但显而易见，“人的文学”是创作主潮。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近五十年，如果作宏观概括，我们以为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与群众的关系的争论、研讨及其实践，既是理论主潮，又是创作主潮。理论主潮与创作主潮尽管关系密切，但分别论述还是可行的、必要的。

二、从六十年间的大量文学创作现象入手进行综合梳理，主要就题材与主题的演进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潮流、人文环境、文学承续联系等方面的关系，并试图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为文学的现实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与创作关系不大的文学论争、意识形态运动等不专门涉及。

三、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试图在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掌握、研究中得出富有研究者个性的结论。我们预料各编都会碰到一些老的或新的难题，在某些难题的研究上如果持之有据，我们将发表一得之见。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正殚精竭虑试图以文学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评判系统。我们的创作思潮研究，应当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寻求的是为这项工程添砖加瓦的愉快。

本课题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

1991年6月

绪 论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文学的范围、起迄时限以及总体特征、性质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是近年来的事。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原先的研究格局，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

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问题上的各种新的区分法，意见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以前的“现代”概念专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确立这一概念的解放初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是合理的可行的，现在看来则未免过于狭窄，不利于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而各种区分法所掌握的标准却不大一样，概括起来大致情况是这样，一种是以社会历史重大变革、社会性质发生变异为划分标准；一种是以文学的划时代变革、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为划分标准。因为掌握的标准

不同，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分期意见，目前不可能统一，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

我们持后一种划分标准，主张将原先的“现代”、“当代”打通，即将“五四”以来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因为我们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是最简单的事实：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现代文学史也应该是这样，它不是规定作家为自己的自然发展服务的“特殊的人格”，它是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追求的客观记录。而这种文学追求，即现代作家活动的总体目的，只能归结到文学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的现代性。以前我们看作现代作家的使命与追求的东西，如反帝反封建、文学大众化、为现实服务等等，不论实践的功过得失如何，似乎只能属于文学现代化中有关现代意识方面的具体问题，远非涵盖面最大的理论概括。

二

我们说现代文学史既然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那么确定它的起迄时限、期段就应以文学的现代化规程为主要依据。

我们不同意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也不同意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贯通起来统称为“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些提法完全抹煞了“五四”时代之于文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现代化的决定性意义。而历史恰恰作了这样的安排：“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于是理所当然地，“五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现代意识的获得对于文学现代化——现代文学的开启的意义。有人据此提出“二十世纪文学”的崭新论点，认为戊戌变法思想、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思潮的逐渐被接受，是国人获得西方型现代意识的开始，文学因而与古代传统发生“全面的深刻的断裂”。此说对纠正文学史界一向怠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对其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估计不足的状况，无疑是极为有益的。但从现代意识角度讲，此论未必精当。自从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后，我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向西方寻找真理，吁求着用先进的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冲击、改造古老的中国肌体。他们从来就是以有限的现代意识呼唤着更先进更开放的现代意识。从近代史看，现代意识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鸦片战争起始，到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承认西方“船坚炮利”，而欲富国强兵，这是现代意识物质层面的表现。这时文学上的现代意识尚处在微弱的萌芽状态，张维屏、魏源等的诗作中的忧患意识，已不再像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那样往往与忠君意识水乳交融了，而与民族民主意识联结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

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到爆发辛亥革命。中国人从“器物”科技上承认不如西方，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①因而演出了一场推翻帝制的壮举。这期间，现代意识在物质层面与心理层面的结合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维新派介绍了诸如进化论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这样的西方科学意识，对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科学制度进行了大的冲击，其功不可磨灭。但他们还不可能彻底否定传统意识，搞的是“托孔改制”，穿起古代衣衫抒发现代心声。这里有一个勇气问题，但主要还是现代意识的储量有限。资产阶级革命派忙于国体、政体的变更，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少有建树。因此，这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上，现代意识没有也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远未渗入到一般的文学表现中，也没有对文学的发展、文学面貌的改观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那时的文学观念没有真正取得现代化的独立地位。文学还被认为是工具性的，是政治或思想的附庸或外壳。“我手写吾口”、“崇白话而废文言”等先进的文学主张，说到底还是强调了文学的实用性，无法推演出全新的现代文学观。小说一度受到特别重视乃因看到了它与“群治”、与“社会改良”的密切关系。一些改良主义者和有一定现代意识的作家从语言、文学形式开始了尝试性的、幼稚的现代化努力，而一些革命家却几乎忘记了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上体现出难以原谅的保守。从那时文坛上，人们也许可以举出三两篇略具现代性的作品来，也许能找到反映文学现代化要求的片言只语来，但真正以现代的文学观念表现出真正现代意识的现代文学那时并没有出现，当然也就远远没有成气候。历史提出了任务，但完成任务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时最值得自豪的是鲁迅等革命民主主义文化战士的崛起。他们的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主张，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在“别求新声于异邦”时显露的民主主义文学观，都成为“五四”现代意识大觉醒的先声。他们属于未来的时代。他们的努力虽未在意识形态领域扭转乾坤（主要是缺乏有力度的作品支撑自己的理论），但这毕竟是黑暗王国中耀眼的光明。

第三个阶段，从袁世凯窃国，到《新青年》创刊。这三、四

年间，与政治低潮相适应，文化上尊孔逆流空前泛滥。戊戌时代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严复等也都作为政治保皇派、文化复古主义者，为尊孔复古逆流推波助澜。资产阶级文学改良成果几乎荡然无存。现代意识被淹没在复古逆流中，难以显现新的雄姿。历史出现了令人窒息的郁闷，令人痛心的曲折。也正是在这时，一代民主主义战士“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清醒地意识到革命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①于是，适逢其时，《新青年》横空出世，揭开了中国文化新时代的序幕。

从现代意识在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极其简单的回顾中，我觉得无论是以鸦片战争为界，还是甲午战争或戊戌维新为界来确定现代文学的上限，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论据，自然也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近八十年的近代史的进程考察，现代意识还处在量的逐渐积累过程中，质变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因而也难以找出划时代的令人信服的重大“界碑”。现代文学只能带着深深的惋惜越过这片贫瘠的土地。

现代意识能够真正立住阵脚，发生广泛社会性、时代性的影响，既要有客观条件——“五四”时代具备了这种条件；还必须要有对传统意识进行全面反思的主观条件——“五四”时代也具备了这种条件。时代造就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民主主义战士。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汲取了外国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营养，“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②他们毅然向传统意识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② 鲁迅：《写在〈坟〉后面》。

举起了投枪。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意识是复杂的，儒家的思想规范和文化观念是其主体；这种体系完备、根深蒂固的意识只有在“五四”这个思想大解放、价值大变革的时代才能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只有在人们明确而响亮地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时才会逐渐失去普遍的社会趋奉心理，只有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才能彻底被时代的弄潮儿所拒斥。如果说“五四”以前西方现代意识已经在中国开了源头，那么到“五四”才真正汇成巨大的、浩浩荡荡的洪流。这时，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在广阔的领域中展开了激战。在对中西文化整体结构的深入解剖中，先驱者进一步发现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一片西优中劣的价值判断声中，从而得出必须彻底与腐朽的传统决裂、以西方模式构建中华文明的结论。于是，现代意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扩大了影响，坚固了营垒；不只是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传播，而是冲击着、改变着广大知识界乃至市民阶层、劳动阶层的精神世界。作为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形象反映物，文学至此当然体现着现代意识的必然要求，当然要以现代意识为崭新的内容质地，而且也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进入它的现代历史。

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在这方面。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是彻底否定旧文学观念的宣言书，他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代表了现代文学观念的最早正式形成。此后又有李大钊的“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相融合的“社会写实”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鲁迅及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创造社为代表的“自我表现”、“艺术独立”的文学观；胡适之的白话文学观和傅斯年的“欧化国语文学”观等等。在我们习惯用反帝反封建来概括现代文学本质的时候，我

们往往未能对这些复杂丰富的文学观念作一番抽象、概括，事实上很难用“反帝反封建文学观”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观”来概括它们且概括得十分准确。但从文学观念现代化的视角上概括它们就比较确切。它们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代意识，体现了现代民主、自由、进步的文学要求。

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当然得力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而现代化的文学观念又促进了中国文坛对外国文学的全方位开放；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气息中，在崭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在外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下，以现代内容和现代形式出现的“五四”新文学发展起来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有着二千多年文明负担的传统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旧文学的“全面的深刻的断裂”正发生在这个时候。“五四”以前当然有了现代文学的萌芽，包括受翻译小说影响的近代现实主义小说、黄遵宪式的新体诗、舶自日本的文明戏等，但就在它们最兴盛的时候也没有体现出取旧文学而代之的气度，事实上也很少有足以与旧文学优秀之作相颉颃的素质。这可称作现代文学的预备期。而随着辛亥革命成果的被窃夺，这一切都在文化复古逆流中被淹没了。“五四”前夕的文学危机证明了传统文学的衰老与腐朽，也宣告了文学改良尝试的半途而废。旧文学的苟延残喘似乎不为别的，只是等待着彻底的、天崩地坍般的裂变！“五四”文学革命正是对这种历史召唤的积极而又有深广度的响应。很难想象，文学上这样一次伟大而彻底的现代性变革，却不能算作文学史分期的“界碑”。

将现代文学史的上限确定在“五四”时期，虽然与当时的政治历史有关，但不是以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划分依据的。（通史上的“五四”系指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五四”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正式提出“民主”与

“科学”口号和一九一七年初正式提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口号为标志。)同样,它的下限也不应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为确定依据。有人认为从“五四”到今天的文学发展史,有着三次“伟大的转折”:“五四”时期;新中国的建立;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如果把“转折”看作是事物的“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①那么没有疑问“五四”和新时期是完全可以这样说的,而新中国的建立,尽管社会历史发生了大的转折,但文学(特别是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并没有全面发生可以堪称“转化”的根本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结束当然可以标明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告一段落,然而反帝反封建并非现代意识的全部,而只是现代意识某一阶段上的部分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始,当然可以标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壮大,但社会主义思想观念跟新民主主义思想观念,从思想体系来看,同属现代意识的范畴。“五四”时期人们就把社会主义(而且是复杂繁多的社会主义),当作现代科学意识介绍进来,加以推崇。正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才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学面临的还是体现并反映现代意识的问题。从“五四”时代就取得定规的现代作家“追求着”的“自己目的”,是文学的现代化,文学体现并反映现代意识,这种意志行动自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因民主革命的成功而中断、停滞,恰恰是要求着新的发展。

此外,现代文学观念也不会因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而中断其内部的调整。这调整的内容包括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关系,

① 列宁:《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如何处理跨文学认同与优化现代文学的关系等。这些关系问题，民主革命时代的文学一直试图解决，由于历史环境与条件等限制，留下了不少教训，势必留待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去解决，这正是文学史的延续性要求。更现实的问题是：文学现代化的内部规律还没有摸清，民主革命时代的文学创作时有失误，文学形态的现代化、文学审美特性等问题有待探索，真正体现现代文学优势的、能打进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作品还未成批成片地产生……总之，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的追求，仍然是“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追求的延续与拓展，不仅没有形成什么“断裂”，而且不论是外在现象联系还是内部逻辑联系都异常紧密，不容分割。

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一部到今天还在继续的现代文学史。

三

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复杂曲折的，记载着文学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对这历史过程进行一个概略的阶段划分，有利于我们把握现代文学的发展节奏、特征，从而对现实文学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以“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为起始，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为终结的俗称“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基本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深刻断裂迅速完成；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大量涌进，促使现代文学观在文坛上发生了普遍、深入的影响；而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又引导出文学形态（文学语言、文学样式与体裁、创作方法与艺术手法等）的全面更新。我们无意全面总结这十年文学的成败得失，只想从现代化视角上概略地谈几点相当粗浅的印象式的意见，即“五四”在审视传统时的俯视一切、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迎纳外

来新潮时的开放、宽容的民主意识；建设新文学时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推崇而体现的独立创造精神。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也许是“五四”文学精神的本质特征。

大凡文学革新运动，总要对前代传统进行或暗或明、或局部或全局、或浅或深的反思，而反思的成果又直接影响着文学建设的总体风貌、特征和性质。“五四”对古代文学传统的反思，是作为康、梁文学改良的逆反现象而出现的，是明火执仗的、全局性的、深刻的反思。先驱者反思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对传统文学所体现的“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意识特别是伦理道德的批判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反思首先是思想的反思），由此兼及其它方面，这就抓住了要害，纲举目张。与前人相比，他们对传统的反思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的大体、使传统经过修复得以延年益寿，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大体、确立与传统异质的现代文学系统；不是立在古人的脚下诚惶诚恐地仰视传统，而是站在古人的肩以上“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俯视传统；不是以感性体验从枝枝节节的局部上检察传统，而是以理性眼光从全局上体系上审视传统；而这种审视又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形式出现的，怀疑中有所珍惜，否定中有所肯定。这自然不是一种亦好亦坏式的全面却难免平庸、拘谨的态度，而是一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不无偏激却时见深刻、睿智的态度。尽管后人可以以更科学的方法、态度审视传统，但“五四”的那种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精神以及所体现的文学方向，在主流上无疑应予充分肯定。

“五四”对传统文学的反思之所以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度和力度，取决于迎纳外来思潮时的开放、宽容的民主意识。“五四”前后的中国局面是帝国主义操纵的北洋军阀统治。这个政权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之中而忙于政治角逐，无暇顾及文化思想动态。